

论新时代中国美学

李庚香 石长平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源自具体历史时期的具体社会实践,美学也不例外,它也应该是在一定时代中孕育并成为时代精神的表征。美学有两个关键词,那就是美与时代。美学固然是研究美的科学,但总是要立足于一定的时代,从时代中获得必要的营养、灵感和动力,体现着一定时代的情趣、意向和精神。20世纪的西方美学经历了心理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文化—历史换轨三个阶段。20世纪初的中国美学,从引入“美学”概念到形成重视审美无功利的静观派、以艺术促进社会进步的人生派,推动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开始传播,可谓波澜起伏。在这里,王国维的“无功利”的静观美学与梁启超关于“文艺新民”的认识有着明显的差异,朱光潜坚持的“直觉”“距离”和“移情”与蔡仪的“客观论”“典型论”也有明显的不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呈现出新中国美学、新时代美学、新世纪美学、新时代美学等美学理论形态。阎国忠指出,美学如果不研究时代,只研究美,是没有出路的。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应当丰富发展新时代中国美学,建立中国美学的主体性,并科学合理阐发其基本内涵和思想价值,这既是美学发展的学科需要,更是把握时代精神、提高国民审美品质的实践需要。

一、新时代中国美学的历史逻辑

新时代中国美学如何发展?美学问题必须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回答时代所面对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美学的逻辑归根结底是由历史的逻辑决定的,美学要发展必须获得时代的支撑。建设和阐释新时代中国美学,正是顺应社会历史发展和时代的要求,遵循美学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美学

中国化的必然理论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其重要的发展阶段和形成的美学形态大致可以这样划分:一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次美学讨论形成的美学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新中国美学”,其特征是政治美学;二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的历史时期,也开始了文艺学与美学的新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为“新时期美学”,其特征是思想启蒙美学;三是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一时期称为“新世纪美学”;四是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明确确立为标志的新的历史时期的美学,当称之为“新时代美学”。

尽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延安时期就已经草创,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50—1960年这一时期,全国范围的美学大讨论使得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学科理论建构,这次全国性的美学大讨论才真正使得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初具规模。当时美学家所关心的是建立美学的哲学基础,试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美学体系。在大讨论中,朱光潜对自己以前的美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自我批判,并部分地接受了他人的批评,扬弃了西方美学特别是克罗齐唯心主义美学,从而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走上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美学大讨论“百家争鸣”的理论氛围促成了美学四大流派的创立,形成了“美是主观的”“美是客观世界的自然属性”“美是客观世界的社会属性”“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等美学思想体系。这四大流派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来论证自己的理论观点:一是蔡仪的客观派,以“客观论”和“实在论”为核心,引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来论证美是客观的;二是

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论述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但其“直觉”“移情”“距离”明显是西方美学的学术理念;三是李泽厚的实践派,利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然的人化”“劳动创造了美”等经典论述来阐发美是社会性和客观性的统一,是实践的产物;四是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坚持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点的主观派。在这个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建设期间,当代美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指导地位。但毫无疑问,囿于特殊的社会历史阶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作中译本的缺失等原因,这一时期的美学片面地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客观和主观进行观点争论和理论建构,因而,使得它明显地带有政治美学的时代特征。同时,这四个学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基于主客二分的二元论立场,美学的学科性与学理性尚不完善。

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时期美学立足于那个特殊时代,有着明显的文化新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时代特征。随着西方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进入,学者们的思想逐渐从“文革”的禁锢中挣脱出来,美学和艺术也从政治传声筒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而且,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有限的学者阶层中展开的讨论不同,形成于该时期的“美学热”是全社会性的,美学热潮中提倡思想解放、审美形式多样化,其在活跃思想文化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在相对封闭的学术环境中进行的,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则与改革开放的大形势相联系。受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观点等的影响,借助西方现代美学哲学思想的推动,以及西方审美思潮和审美行为方式的影响,在社会文化领域进行思想启蒙,新时期“美学热”就具有了总体的社会文化意义,其“实践美学”体系,就吸收了荣格的“积淀”说、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理论以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等。基于这种理论背景,美学研究的重点一度从美的本质和根源研究转向了文化研究,审美的大众化成为新特点,美学研究出现多元化趋势。一些研究者从个体人的现实生存出发关注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强调个体人的感性生活和生存状态,如潘

知常的生命美学就是在80年代后期提出的。这使得审美与艺术实践走出象牙塔而成为大众日常审美,丰富了美学研究的层次,具有积极的美学普及意义。这一时期的理论话题也不断转换,从20世纪80年代初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到从“手稿”引发的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讨论,形成了不少理论的生长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刘纲纪丰富发展了实践美学,提出并建立了实践本体论美学;周来祥提出了“辩证的和谐论美学”;蒋孔阳的《美学新论》开启了新实践美学的思路,创立了人生论实践美学,从而使得实践论美学在那一时期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导美学流派。总体来看,该时期思想活跃、充满生机,是美学研究多元化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学学科建设日臻完善,无论是惠济干预世时的社会意义还是美学学科的建设意义都非常显著。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后期,一些审美方式和艺术实践为资本裹挟,在不健康的价值观中走向庸俗。“美学热”之后出现了学科的分化,美学理论研究走向了两极,要么走向具体的感性的人,以个体人的生命体验取代“类”的人的审美普遍性;要么继续在哲学美学的领域内进行哲学基础的建设,没有深入倾听时代的呼唤并对其作出积极的回应,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度弱化,理论逐渐脱离了实际。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期,随着西方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大量涌入中国,一些学者不满李泽厚的客观社会派美学理论体系,发起了一场“超越实践美学”的批判反思活动,与坚持实践美学观点的学者展开了争论,形成了新世纪美学,但社会影响力却不存在。在这次争论中,兴起了所谓的后实践美学理论,如杨春时的“超越美学”、王一川的“体验美学”和吴炫的否定主义美学等。同时,也形成了新实践美学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实践美学。马克思主义学说始终把人的问题、把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放在重要的地位,它把寻求人类的完全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在新实践美学中,主要有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邓晓芒、易中天的“情感论实践美学”,张玉能的“新实践美学”和阎国忠的“新实践本体论美学”等。新实践美学把美学研究的问题域转向“生

活世界”，着重指向了“人生在世”，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欲求，凸显人学维度，体现出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等问题的关切。而阎国忠教授建构的以“爱”“信仰”等为核心范畴的新实践本体论人学美学，表明当下实践论美学在人学理论研究上趋于成熟。在此前后，还出现了曾繁仁的生态美学、程相占的“生生美学”、刘悦笛的生活美学、李志宏的认知美学、王建疆的别现代主义美学以及王晓华的身体美学等。这些美学思想都为新时代中国美学的建构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启发。特别是生态美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以来，进入新世纪，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汲取营养不断丰富发展。生态美学是在新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新的存在观，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达到和谐一致的生态审美观，也是对人类美好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双重构建，表达了对完整的幸福生活的向往，是一种新时代的审美理想，它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所持守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观点一起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美学的一部分。这一阶段的美学都进一步批判汲取西方现当代美学思想，挖掘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思想，在特定的文化资源中和一定的领域内进行深入的研究，试图通过话语创新来实现理论创新，学理性较强，体系性明显，思想深度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其历史贡献。但也造成了理论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如高建平在论及这一时期中国文论时所指出的那样：“从理论到理论，无法深究理论背后的意义，也无法与中国的现实相联系。这是新世纪文艺思潮和文学理论所遗留下的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很多地方都还存在。”追求“非功利性”的美学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需要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获得时代的营养和动力，建设体现时代情趣意向和精神品格的新的美学理论形态。无论是自由美学（在高尔泰那里，“美是自由的象征”；在李泽厚那里，“美是自由的形式”）、和谐美学、生命美学、生态美学，还是生活美学，开始体现出美学研究的泛化和多元性。

早在2010年，阎国忠先生就在《中国美学缺少什么》一文中指出：“中国美学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有了很大发展，但还缺少借以与现实对话的话语

和批判的、否定的精神；缺少对人的整体把握和爱这个理论维度；缺少形而上的追问和相应信仰的支撑。”而且从根本上说，缺少的是可以作为依恃的、与时代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及审美和艺术发展相适应的哲学，而这个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因而，我们的美学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哲学基础，批判地吸纳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西方古典哲学美学与当代美学的优秀成果。新时代，中国美学正在经历低潮以后的复兴，美学发展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内在的逻辑规律，它要求有一种新的美学理论形态在前阶段形成的理论基础上来“接着讲”。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下，美学家们各自建立自己的体系，目的是寻找和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许多重要的美学家都不再致力于建构大体系，而是带着“研究问题”的态度致力于学科基础建设。新时代，为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重返中国美学的母体，与叶朗提出的“美在意象”说相呼应，我们提出的“美在道情”说，就体现了对新时代中国美学的最新探索。这样的新美学回应时代呼唤，在自身的理论前提基础上，更加关切社会新情况，研究时代新问题，同时关注不同学者的美学思考，在当下中国不同学术流派中展开深入的学术对话，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基本理论形态，借鉴吸收包括生态美学、生活美学在内的国内外其他美学思想，建构既根植于中国传统又具有当代性的美学理论，从美学研究中的“天人相分”重返“天人合一”，这样的新的美学理论应该叫作新时代美学。它是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到当下的逻辑必然，是时代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的理论形态。

二、新时代与新时代中国美学的基本内涵

新时代从党的十八大开始，党的十九大正式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进入新时代可以有多个标志。从社会学或者美学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提炼和概括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志，它可以看作中国进入新时代的里程碑。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全面部署了文化强国战略，明确提出了“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是国家层面的发展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就在价值论的哲学基础上为国家、社会和个人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and 进取目标。归纳21世纪之初美学理论的发展成果,总结美学理论的发展规律,同时从美学层面来考察解读这个时代,或者说从这个时代的政治思想、社会观念和文化精神里探析指证蕴含其中的美学意蕴,从哲学高度给予概括,在学理上予以阐释并赋予应有的理论形态,这一美学就是新时代美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所谓新时代美学,就是中华美学精神在当代的表现,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在当下的新的理论形态。

当然,这一美学形态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学术依据和切近的社会语境的。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美学奠定了哲学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及其哲学基础孕育和催生了新的理论形态。其次,正如前文所述,新时代美学的兴起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发展与同时期其他美学理论相互启发、弥轮融摄的逻辑必然。近年,实践论美学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为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以新时代美学现象为理论营养和动力,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积极与当代西方美学展开对话,建构了实践本体论美学、实践和谐论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等,但其发展也出现了由分而合的趋势,都指向了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和谐进步、人类共同繁荣等重大问题,凸显了人学维度和生态维度。新时代美学,可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在当代发展的逻辑必然。这样的美学以其固有的理论品质,必然就是通向真、善、美、爱的终极关怀的信仰美学,是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绿色美学,是以人道主义和新道德主义为基础的人学美学,是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美育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理论。包含着这些思想内涵和理论指归的美学就是新时代美学。再次,当代审美文化发展和新的文艺现象的涌现以及新的社会问题为新时代美学的兴起提供了实践基础。狄尔泰说:“所有精神创造都源于内在生活(目的欲、生命体验、价值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关系。”网络文化和数字媒介的发

展,具有后现代意义的建筑和工艺设计品等审美现象的出现,具有前现代与现代观念杂糅特征的别现代主义审美文化的产生等,这些都需要一种新的美学来重新诠释。从解构和批判的意义上,前现代的保守落后,后现代主义中的消极虚无元素,现代生活中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娱乐至上主义等也需要从美学高度予以批判。同时,在新的历史时代,环境美学、生命美学、人类学美学等研究也取得了新的发展,它们与时代之间的关系问题也需要得到合理解答。新时代美学应该具有当代性,能够积极反映、回答和阐释这个时代的诸多新问题、新现象,并以更新的理论面貌和向上向善的精神内涵引领时代审美潮流,以美淑世,净化和完善每个个体,健全社会,进而提升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境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新时代美学应当具有社会政治语境,美学的自足性和非功利性等特征并不能使其成为一个独特的思想领域,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和理论话语,它总是在特定的时代政治语境下形成,不可能脱离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诸多著作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就认为,美学话语的建构与现代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的建构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下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美学既参与构成了这一意识形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规约引导着这一政治意识形态,这样就不可能不探讨和考量政治话语所包含的审美意识倾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多次讲到美学,强调崇高之美、信仰之美,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之一,这些都体现了执政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认知,对中华美学精神的新发展,对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政治倾向。马克思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彻底的人道主义与彻底的自然主义的统一”是马克思关于人与人类发

展的两个重要命题。十九大报告讲的“美好生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等，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命题在特定历史时代的新阐释。从一定意义上讲，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美好生活”的最终目标，这样的目标要建立在全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各国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上，建立在保护生态环境、构建生态文明的基础上。因此，考察政治话语形态的影响，就可以看出中国当下的美学精神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与中华美学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风云际会，是在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新的思想结晶。

结合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和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新时代美学的基本问题是人与自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发展与人的需求的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以及全人类的和平相处共同进步等重大问题。这样看来，新时代美学有一个基本的核心范畴，那就是自然生态、美好生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是一个从自然到人，从单个个体的人到共同体的人民，由具体的民族国家的人民再到全部人类的逻辑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新时代中国美学主要包括以美丽中国为目标的生态之美，以美好生活为追求的富乐之美，以协和万邦的“命运共同体”为理想的大同之美。

三、人与自然：以美丽中国为目标的生态美学

人和人类的历史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本身是自然史及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就是马克思对自然和人的历史的关系的看法。这里，一方面是先于人存在的自然，另一方面是人类。而使自然界生成人，使人与自然达到统一的决定性的根本的东西是物质生产实践，美和美感正是在人类的实践中诞生。因而，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也是人类追求美的

历史。

生态概念虽然来自西方，但中国古人在生态智慧和生态情怀方面有着丰富的认知和经验，形成了厚重的“知和知常知变”的生态文化。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生态的记述，比如《逸周书》说夏朝的禹就规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管子·立政》要求“敬山泽林藪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吕氏春秋》告诫人们“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藪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淮南子》中训示的“孕育不得杀，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这既是一种生态文明制度，更是一种生态伦理观念。《周易》的“生生之谓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孔子的“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荀子的“人与天地相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等构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位育中和”思想；道家的“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论；佛家的“众生平等”“善待众生”“节欲惜物”等，都有着深切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强烈的生态伦理关怀，包含十分丰富的生态思想和审美内涵。

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认识是一种原始的形而上的自然观，站在人的自然属性角度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新时代的生态观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汲取和倡扬了古人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形成了以美丽中国建设为目标的生态美学思想，这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当代阐释，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时代发展。生态美是新时代中国美学思想的重要范畴。新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提出了“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论述既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科学自然观和生态文明审美观，也体现了以自然为美的生态美学观。新时代的生态美学思想包含宏阔，但主要内涵是生态理念之美、生态实践之美和绿色家园之美。

生态理念之美。《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

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体现了原始朴素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经历快速的经济发展中逐渐认识到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走环境友好型发展之路,“科学发展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正是秉承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具体体现。200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湖州考察时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从美学维度表达了新时代中国的生态理念。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观点通过法律和政策转化为国家意志,反映了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决心与信心,由于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的意愿,因此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价值理念和审美理念。在社会各阶层中,“生态”成为人们的基本审美追求,生态居住、生态出行、生态食品等等已经表现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日常生活生态审美化业已成为人们的共同理念。这样的生态理念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美观照,是对自然美和社会美规律的深刻把握。这一思想与“仁民爱物”“天人合一”“人与天地相参”等古代生态思想密切相连,体现着显明的生态理念之美。

生态实践之美。儒家的“仁民爱物”、佛家的“节欲惜物”和道家的“知止不殆”的生活态度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引领了社会的良好生活行为风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是人和人类自身得以保存和发展的需要,但是必须按照自然之“道”行事,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太上感应篇》说“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就是要按照自然之道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之物。生态实践之美主要体现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践行生态理念所做出的审美实践。早在200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就阐发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发展三阶段的观点。他对于第一个阶段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因为这一时期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而一味索取资源。在第二个阶段,经济发展和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国家和人民在实践中已经注意到了生态问题,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

发展的根本,开始实施保护性开发,这一阶段既要金山银山,但也要保住绿水青山,生态实践之美开始显现。第三个阶段,国家和人民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优势与经济优势形成了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达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第二、三阶段就是具体实践的阶段,这两个阶段,就是要形成如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要建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

这一时期是全面深刻实践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时期,也是进入新时代之后的时期,国家在政策层面出台了一系列生态保护政策和法律,对大气、水体、土壤、森林等进行了严格的保护。据求是网提供的资料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制定、修订法律8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现全国覆盖,出台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改革方案,持续加强了生态环境保护机构队伍建设,加快推进了环保机构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持续加大了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十三五”期间,全社会环保投资4万多亿元,同时向联合国交存《巴黎协定》批准文书等,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目前,在中国很多地方,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改善有了深切的直观感受,周边的生态环境正变得美丽起来:白天蓝天白云,夜晚星河灿烂,江河湖泊清水绿岸、鱼翔浅底,山岭田园树林苍翠、鸟语花香。不论是生态实践的过程,还是实践的结果,都真切地展现了新时代生态实践之美。

生态实践之美同时还体现在生态和环境理论的创新实践上。近年,生态美学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曾繁仁的生态美学、程相占的生生美学以及袁鼎生的整生论等。随着生态美学的发展,以曾繁仁为代表的生态存在论美学以海德格尔的后期存在论思想为理论根基,吸纳了《周易》生命美学思想以及老庄思想,发展丰富了中国存在论美学。2002年,曾繁仁教授的《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认为,生态美学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存在问题,“营造美好的精神家园,获得高层次的情感慰藉和精神升华。这就是一种审美的超越和升华,正是生态美学的本意和精髓”。为构建生态美学,实现中国传统生态价值观的当代转化,程相占教授在

2002年提出生生美学。生生美学取自《周易》中的“生生之谓易”，以“天地为大美”作为审美理想和美学观念，其思想扎根于中国传统生生美学的哲学本体论，成为生态美学最新的理论形态。生态审美是以生态伦理学为思想基础的审美活动，摒弃了基于人与世界对立、主客二分的传统审美模式，代之以人与世界融合为一体的“审美交融”模式。

环境美学理论近年也取得了创新发展。2011年，王焱在《近十年来国内环境美学研究述评》一文中统计，2001年到2011年10年间，国内学者在报刊上发表有关环境美学的论文100多篇，还出版了不少专著和译著。从2012年至今，刊发有关环境美学的论文300多篇，其中陈望衡、薛富兴等学者都有不少学术创新，如陈望衡的《环境美学》《我们的家园：环境美学谈》、薛富兴的《山水精神》等著作，在环境美学研究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望衡对中国环境美学的学科定位和研究对象也做出了基本界定，认为环境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审美要求，环境美感对于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进而探讨这种影响和作用对于人们身体健康等的影响，是生活美学的重要内容。这些思想观点进一步促进了环境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绿色家园之美。陈望衡说过：中国古代的环境意识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向着两个方面展开，其一就是家园意识。物质的自然对人的意义主要表现在资源和环境两个方面，环境侧重于人身体上和心灵上的安顿，作为身体与心灵安顿之所的环境通常被称为家园。家园是环境问题的核心，环境审美的本质即是家园感，中国古代环境美学的一大特点就是重视田园环境的审美。

陶渊明在庐山脚下为自己筑建的田园是安放身心的绿色家园，用日常生活实践着他的桃花源情怀。在《归园田居》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读山海经》里，“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等，都可以看到其对于复归自然家园的闲适愉悦。后世的田园山水诗句诸如“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东篱摘芳菊，想见竹林游”等，都可看出自古以来人们对绿色美丽家园的赞美与向往。

一般认为，家园可确指客观具体的居住生活空间，一般意义上的生活家园同时又包含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家园。生活家园作为生命的起点，为生命提供延续和展开的有形场所；而精神家园则蕴含人类的记忆和文化积淀，是精神的无形栖息地，与生活家园一起构成人存在之根柢。“家园”在诗意栖居中指的是人置身的处所，是带来“在家”之感的特殊空间，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德国生态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家园”概念带有极强的精神归宿感，受其诗学的影响，“家园”的形而上内涵得到了确认。在这里，家园首先是有形的生存环境，其次是上升到精神栖居之所的无形之境，两者是内在统一的。绿色家园之美所要表现的就是以人的“诗意栖居”为指归，以审美生存为鹄的的生活环境所呈现出来的美。但这种家园之美不是纯任自然的原始状态，而是在具体的历史阶段、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同时发展、辩证统一的过程和结果。从全球文明进程来看，新时代着力建设的是后工业时期天人合一的绿色文明，绿色家园既是美好生活的环境组成部分，也是合乎社会历史进步的文明潮流。

绿色家园的建设必须依托具体的生态地理环境，亦即依托山水林田湖草，并与之一起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命运共同体中，人是最重要、最具有能动性的一部分。这样的理解，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自然主义观，也是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当代阐发。老子《道德经》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似乎与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和“诗意栖居”相一致，体现着对生命之美和绿色生态家园之美的追求。良好的人居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生态惠民和生态为民，说到底就是居住环境的生态质量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言说，表达的是自然生态美与绿色家园之美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田园美的内涵追求。“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建设天蓝水清的美丽中国，就是对绿色家园美的追求，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界是人类栖息的家园,优美的自然环境使人身心得以放松,心灵得到净化,情操得到陶冶,精神得到升华,行为趋于善美,促进人按美的规律行事,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在现实中,无论什么样的美好生活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的存在,而其前提都应该是在一个天蓝水碧、花香鸟语的优美自然环境中呈现。“天地存则人存,天地灭则人灭。”美好生活是新时代生活的目标导向和价值追求,而生态之美不仅是整个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必要的前提。

四、人与人:以美好生活为追求的富乐之美

富乐,简要来讲就是富裕而安乐。富乐一词较早见于《史记·张仪列传》:“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汉书·食货志上》:“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贾谊是这样表述的:“夫为人臣者,以·7·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就是说执政者成功的政绩,应当表现为使民众“富乐”。实际上,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类似的表述,《道德经》第八十章中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所表达的也正是后世所言的富乐。

富的意思很明显,就是物质丰厚,衣食无忧。富裕生活可以使百姓安生,国家安平。“富安天下”的思想是儒学民本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以民为本的原则,首先应当落实于使民众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上。而“富乐”的“乐”是指什么呢?在“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中,“岁孰”,孰通熟,是指风调雨顺的丰收之年;“且美”中的“美”就主要指物质之外的东西了,诸如无徭役、无苛税、无盗贼、无战乱等社会政治因素,再进一步,就是有互尊互敬、互助互爱和公平正义等社会生活氛围。只有“孰”和“美”同时具足,才会有“则民大富乐”的结果。在《道德经》“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中,“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毫无疑问是物质生活富裕,而“乐其俗”的“俗”就是社会风俗,它应该包含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平等自由、相互尊敬的社会生活环境等。也唯有这些因素的存在,才可能有“乐”,仅仅吃饱穿暖、吃好穿好住好,只能是“富”,所获得感受最多是生理层面的满足感,不能“安”,没有安全感,就遑论心理和精神意义上的“乐”了。真正的“乐”,就是悦心惬意和精神

志畅爽,是超越了作为身体感觉的温饱层级的精神之乐。在贾谊的“以富乐民为功”的理想中,“乐”,也不仅仅是说让百姓因“富”而“乐”,而是另有深意的,指的应该是除生活上足食丰衣之外,能够获得诸如法治、公平、正义等社会政治环境具足后带来的精神之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这其实就是建设“美好生活”在那一历史时期的另一种表达。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历史的发展赋予了“美好生活”更多的内涵。正如首都师范大学王淑芹教授所言,从抽象意义来讲,“美好生活”是人的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协调发展的一种不断进步的生活态势,包括丰裕的物质生活、权利得到有效保护的心安生活、人格得到尊重的平等生活、美德受到敬重的道德生活、个性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活。这其实也正是古人所追求的“富乐”,因此,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有关论述,所谓富乐之美,简而言之,就是由于个人拥有丰裕的物质财富和充分的公民基本权利,人格平等、道德敬重、自由发展得到全面保障而体现出来的社会美。

这样看来,追求美好生活的富乐是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等广泛领域内的整体美好。相应地,体现出来的富乐之美也就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具体表现为物质层面的富足之美、政治领域的善治之美、社会生活层次的和谐之美、文化生活维度的丰富高雅之美、个人发展层面的意志自由之美、道德领域的尊爱圣善之美和精神领域里的信仰之美等。

经济领域里充裕的物质生活所表现的富足之美。不富无以养民情。只有在充足的生活物质保障基础上,人们才能拥有更高质量的美好生活,物质丰裕是物质基础。人类所进行的一切生产实践活动,都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以便从“物”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衣食住行无忧,过上富裕生活,获得基本层次的富足之美。

政治领域里的善治之美。有充分的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因而,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所有合法权利得到有效保护是人民“富乐”

的最为基本的内容。在《民法典》时代,人们的基本权利在法律保护下实现“应得”之利,真正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精神。同时,人格得到尊重是人民“富乐”的本质要求。在社会交往中,人格的独立性与做人的尊严受政府公权力的保护,不受资本等权势的侵犯,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在免于恐惧的自由中安居乐业,这就是善治之美。

社会领域表现为安定和谐之美。人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是否安定和谐、秩序良好,直接影响着人们美好生活的实现。人们遵道守德、社会崇道敬德,仁义正气盛行,社会有序和谐。

文化领域表现为丰富高雅之美。文化生活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享受的活动。在物质生活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就愈显重要。“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这是巴金散文《灯》中的名言。由高雅文化提供的精神生活是美好生活的主要指标之一,也是人的生命本质得以充分实现的重要途径和表征,拥有丰富高雅的精神文化则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德领域表现为尊爱圣善之美。道德是人性完善的需要,道德自律所展现的是人性光辉。在儒家思想中,修德是通向仁爱与成圣的手段和目的;在克尔凯郭尔关于人的存在的三层次论中,第二阶段为道德伦理阶段。在这个阶段,个人所欲与社会义务结合起来,遵守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准则和义务,赞美善良、正直和仁爱等美德,趋善避恶、崇尚理想等。尊爱他人,最终实现的是对人性自身尊严的尊重。促发人性向上向善向美,使社会成员的品行闪耀着人性的美与善,这就是尊爱圣善之美。

道德是精神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但并不是全部,也不是最高。因此,在精神领域里最高境界表现为信仰之美。人不能没有信仰,富乐之美最高的境界就是有精神信仰。近年一些学者如阎国忠等曾对此进行过深刻论述,潘知常甚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信仰起来”。一般来说,信仰有宗教的信仰和理性的信仰两种,它可以表述为一种实体如上帝等,可以表述为一种理念理想如绝对理念等,也可以表述为一种境界如终极境界等。宗教信仰的目的是通过获得神

的怜悯与赐福来救赎自我,理性信仰的目的则是通过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为自己树立一种价值标准和理想境界。信仰本质上是从此岸的、经验的世界向彼岸的、超验世界的超越,信仰的终极指向是真、善、美,而美又内在地包含着真和善,因此,美学可以成为理性的信仰,信仰具有美的特质。信仰意味着人有了一种最高的需求,意味着人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之外有了一种超越的精神生活。一个人如果只以物质的方式活着,他的生命总体是非本质性的,因此,人需要精神的生存方式,只有行走在通往理想境界亦即信仰的路途中,他的生命本质才有可能得以实现。在此意义上,富乐之美在精神领域里表现为信仰之美。

个性得到完善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民“美好生活”的最终目标。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解放人、发展人。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的解放史。人的个性得到完善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在法律与道德框架下,使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开发,个人的才智得到充分展现,个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这就是自由意志之美。这时,人回归人的本性,与自然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成为审美的人,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对美好生活的感受体现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审美体验、审美评价,一如十九大报告所说的那样,使人民具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富乐”的美感体现就是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指的是建立在物质生活水平切实提高基础上的满足,还包括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提升的亲身体会。幸福感强调的是在自身需要得到满足条件下产生的喜悦情绪,指在自身生活和工作中享有的诸如自尊和自豪等身心愉悦的精神状态,更是指在自己追寻和实现中得到的诸如社会认同和价值共鸣等欣喜快慰的心灵体验。安全感凸显的是一种渴望长期和长效稳定的心理诉求,体现着对当前财产和生命安全以及意志自由的稳定预期,体现着对未来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的殷切期待。

人对于富乐的追求是有其哲学和心理学依据的。依照张玉能先生的理解,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分

为“人的需要即他的本性”(《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是人类的特性”(《巴黎手稿》)、“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论纲》)三个层次,使得这个命题的内涵变得立体化、丰富化。这些论述组成了关于人的本质的三大主要层面,人的需要是人的本质的内在根据,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的核心,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的现实表现。在这种“需要-劳动-关系”的人的本质结构之中,“人的需要即他的本性”是第一性的,而且需要是在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中不断增加、不断丰富,逐步趋向更高层次的,亦即从物质到精神的追求阶段。

人文主义心理学家和美学家马斯洛的需要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美好生活”在新的历史时代必然经过由富而乐这一过程的依据。他认为,人有物质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这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层次,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当现实的物质需要满足后,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人的需要也就生成出认知需要、审美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道德需要等精神性需要。也就是说,当物质需要的温饱解决之后,精神需要就成为匮乏性需要,而匮乏性需要就具有当下性、必然性、迫切性等特征,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他的“自然人”“功利人”“伦理人”“天地人”也深刻揭示了这一过程。在新时代,追求“乐”所具备的种种内涵的普遍社会心理,正是这一理论的真实体现。

人民是社会生活的创造者,是追求和实现富乐之美的主体。尽管实现富乐之美的美好生活需要社会全体大众具备相应的感知能力、审美修养、人格追求和精神境界等美育素养,但这是一个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过程,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美学思想的核心。

五、人与人类:以协和万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想的大同之美

“大同”之美,即“和合”之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和合”思想。一般认为,真正从哲学高度明确提出和合思想的是西周末年的史伯,他说: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

思是协调族众与百姓的团结。“和”与“合”都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重要范畴,《说文解字》解释“和,相应也”,即不同事物之间的配合,和谐一致;“合,合口也”,即口的上下唇和上下齿的闭合,引申为符合、相合之意。“和合”一词中,“和”一般解释为和谐、协和、中和,“合”就是融合、合成。“和合学”建构者张立文先生认为,“和合”更强调多样性的统一与合作共赢。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向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大同社会”。共同体是“同”,这个“同”就是“和同”,是“和合”的结果,这种“和合”,就是世界各国多样性的统一与合作共赢,因而,“命运共同体”概念饱含着中华传统美学思想,是和合思想的当代阐释。1985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和平与发展”问题;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互相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首次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中提出了“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个构建”,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坚持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使这一概念成为新时代政治学和美学的核心范畴。

“人类命运共同体”业已成为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人类未来命运的哲学思考,包含着深刻丰富的和合美学意蕴。具体地讲,应当就是天人相合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国家观,上升到哲学美学高度,在这“三观”上所呈现出来的美就可以称之为和合之美。考量中国古圣先贤对于和合的诠释和阐发,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美学思想,可以见出,和合之美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意蕴结构,依照其内在逻辑可以析分为“合睽”之美、“和生”之美、“和处”之美与和谐之美。“合睽”之美,《说文》中说:

“睽，目不相视也。”因而，睽的本义是两只眼睛不朝一个地方看，其引申义为互相分离、背离、不合的意思。程颐释睽卦《象辞》：“男女异质，睽也，而相求之志则通也。生物万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禀阴阳之气，则相类也。物虽异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群生之众，睽散万殊，而圣人为能同之，处睽之时，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程颐推“物理”之同而要走向的“合睽”之道，就是“和同”“和合”之道，并最终走向“同天下而和合万类”的全人类的“和处”。程颐说过：“凡天下至于一国一家，至于万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间也，无间则合矣。以至天地之生，万物之成，皆合而后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间也。若君臣父子亲戚朋友之间，有离贰怨隙者，盖谗邪间于其间也。除去之，则和合矣，故间隔者，天下之大害也。”冯友兰先生更是把这一思想升华为“仇必和而解”。世界各国的矛盾冲突原因可能很多，但概括起来就是间隔。间隔隔阂破坏相互协作，破坏“和处”，只有去除“睽”，才能成就天下万事的“和合”。目前世界上造成“间隔”的，有历史原因、文化原因、种族原因、意识形态原因等，因而“间隔”的种类也很多，有偏见，有误会，也有怨尤和仇恨，如以色列与叙利亚、印度与巴基斯坦、韩国与朝鲜等。因此，“合睽”就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那些有隔阂仇怨的国家政府和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大智慧、大气度、大魄力面向未来，共捐前嫌，一笑泯恩仇，由不睦走向和解最后达到和睦，由此所体现出来的美就是“合睽”之美。

“和生”之美，简言之，不同国家和地区和民族之间迥异的文化以开放的姿态和包容的气量，相互交流碰撞、相互含摄融合生成新文化新文明，这样的过程和结果所呈现出来的美就是“和生”之美。在中国古代，“和生”的基本意义是阴阳相合而生万物。《礼记·月令》说春天“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就是天地阴阳二气和同的结果，其实质是“和生”。孔颖达《周易正义》引庄氏云“天地氤氲，和合二气，共生万物”，也是此意，因此阴阳两体之互动和合就成为“和生”的基本意义。《周易》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名词，是创造生命、抚养生命的意义，“生生之谓易”，前一个“生”是动词，后一个“生”是名词，即使得万物获

得旺盛的生命，也就是创生生命。就“和生”而言，“和”是手段，“生物”才是目的。史伯认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同事物的“和”不能生物，只有不同事物之和才能创生新的事物，正是不同事物的相互结合与转化而相生，才造就了纷繁复杂的世界。天地万物的生成长养，都是“合而后能遂”的，文化也是如此。具体到国家民族之间，则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国家的精神和价值观，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交流、交融，最后产生出新的文化和文明。“五行”合成的是天下万物的生成，即为“和生”，而“和生”中异质文化来源多样，新生成的文化形式也就丰富多彩，就会具备“出千品，具万方”的多样性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文明范式。

“和处”之美。“和处”就是彼此之间没有了隔阂，或者已经捐弃、搁置了隔阂和争议，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发生冲突和战争，大家和平共处，天下太平。这种由于和平相处各个国家治平安宁所表现出来的美即是“和处”之美。中国古代儒家从提倡人际关系和谐角度出发推及国家关系，从“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世界和事物多样性的实际出发，主张孔子所推重的“知和”“中和”等思想来协和万邦；墨子主张“兼爱”，指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这些深厚的传统文化都为我们今天倡扬的“和处”提供了思想智慧。

“和平共处”理念的提出与运用在国际关系上可以上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1954年在处理与印度的关系时我国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5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通过了会议宣言，写入周恩来总理最早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认这一原则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1984年，邓小平同志在《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中进一步强调：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只有世界各国在相互关系中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局势才能得到缓和，世界和平才能得到维护。“和处”之美，对于“文明冲突论”是一种驳斥，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个证明。新时代所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和处”思想，正是在这一原则基础上的

发展,更深刻地道出了和平共处的实质和由此体现出来的“礼之用,和为贵”的天下太平之美。

和谐之美。和谐之美指的是在“命运共同体”中,世界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由于和平和睦和衷和乐而“合处”所体现出来的美。和谐是美或曰美是和谐由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首先提出,以其解释宇宙在本性上是和谐的因而是美的。中国古代在《尚书·舜典》中较早提出了“和谐”的思想:“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里说诗歌、音乐与舞蹈整体上都是和谐的,这里“和”与“谐”的含义是一致的。《左传·襄公十一年》又记载:“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以乐作比,讲社会人际关系的“和”,并且明确地把“和”与“谐”联系起来。但直接使用“和谐”一词的则是《周易正义》《周易集解》,它们在总释“元亨利贞”时直接使用了“和谐”。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的美学和《周易》的美学,两者都以宇宙的“和谐”为美。刘纲纪认为,宇宙之所以是和谐的,以及和谐之所以被看作美,就因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向人显示了看来无限杂多、变化不定的自然万物,具有相互协调、不断生长变化的合规律性……作为这种合规律性表现的和谐,对人就具有了美的意义。在中国,和谐理论的提出首先不是为了解释音乐的和谐,而是为了说明“和”对人的生命以及社会伦理政治所具有的意义,把宇宙自然生命的和谐与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和谐看作相通、一致的。由人与自身的和谐,推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由人与社会的和谐,推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再推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

大同之美落实到终极就是实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之间的和谐,正是因为目前世界上还

不太平,矛盾丛生,危机四伏,还存在战争与杀戮,因而“和合”才是必要的手段和必需的途径。在此过程中,通过消解恩怨、握手言和实现“合睽”之美,通过在思想意识、制度体制等文化层面取长补短、相互交融而达到“和生”之美,通过遵循和而不同、和睦共处而臻于“和处”之美,最终实现世界各国之间、各个民族之间的和谐之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美在天下观和国家观上强调的是协和万邦,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由此构建一个大道盛行、讲信修睦、其乐融融的地球村,构建一个天下承平、圆融和谐的世界。

综上所述,中国新时代的美学是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在当今时代的表现,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下中国所呈现出的新的理论形态,它包含了生态美、富乐美与大同美等主要内涵,体现了与物为春、与己为乐、与人为善的新时代特质,而且这些内涵会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断增值丰富,将会有更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因而也将会具有更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同时,新时代中国美学还应正视新技术带来的挑战。我们认为,美学在面对技术所带来的挑战时不能采取反技术的立场,而应拥抱现代科技创新。当然,这样的一种理论创新也还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地接受检验,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完善。

作者简介:李庚香,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党组书记,郑州大学中原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黄河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带头人,美学硕士、法学博士;石长平,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授、文学博士。

(摘自《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